

# 从“公车上书”看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的编写与教学

宣萱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DOI:10.32629/mef.v8i21.18305

**[摘要]** 本文围绕统编高中教材《中外历史纲要》对“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展开研究。近年来学界对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历史教材的编写既要反映学术共识又要处理学术分歧,要将学界的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符合学生学情的学习材料。本文旨在对“公车上书”真伪考证的相关学术动态进行简要梳理和综合性评述,并就教材编写时如何吸纳与转化有关“公车上书”学术研究新成果的问题做初步思考。

**[关键词]** “公车上书”; 中国近代史; 中外历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 G623.41 **文献标识码:** A

## Examining the 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of the Unified Edition of 'Outline of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tition from the Official Vehicle'

Xuan Xuan

Humanities College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arrative of the historical event 'Gongche Shangshu' in the unified high school textbook Outline of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detaile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Gongche Shangshu' led by Kang Youwei,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research findings.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textbooks must reflect academic consensus while addressing scholarly disagreements, and it should transform cutting-edge academic research into learn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student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cent academic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Gongche Shangshu,' and offers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how textbook compilation can incorporate and transform new academic findings related to this event.

**[Key words]** 'Gongche Shangsh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utline of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 引言

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戊戌变法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学界对“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真伪的不断考证影响了高中历史教材对于此事的表述,也影响了教师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教学。

### 1 学界对于“公车上书”事件真伪的分歧与共识

20世纪90年代的论辩主要在姜鸣与汤志钧之间展开,二人围绕“甲午战后有没有‘公车上书’?康有为有没有发动‘公车上书’?康有为的自述是不是一次‘大欺骗’?”三个问题展开讨论。1996年,姜鸣依据档案材料提出最早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是大批现职官员,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最有影响力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激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作者根据

都察院这一时期并没有拒收其他举人上书的情况,推断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甚至猜测康有为写此上书的目的,很可能一开始就准备在上海发表,是一种舆论宣传的手段,并将这种宣传评价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登台亮相的第一幕演出”。这篇文章于1999年7月被《光明日报》刊出,在社会上引起了众多议论。同年12月,汤志钧针对姜鸣的观点发表了反驳文章,引用《汪康年师友书札》和天津的《直报》等材料指出确有“公车上书”一事。

最著名的关于“公车上书”问题的论辩以同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茅海建与房德邻二人的论争为代表。他们二人主要围绕:“谁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文廷式等京官究竟有无暗中策动组织‘公车上书’?康有为究竟是不是‘公车上书’这一政治活动的领袖?”三个问题展开论辩。茅海建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

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作者认为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在三月二十日光绪帝旨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由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发动、文廷式等京官组织、各省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这一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微弱的作用，而康有为自述中的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80人的上书一事只是其中的一件，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由于并未呈递，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作用。后一概念原为前一概念的组成部分，但康有为在叙述中有意放大后一概念的事件影响力，关于此事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由于他是戊戌维新的亲历者以及关键人物，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但是与此同时，作者也承认康有为所撰写的这一份上书确有它的精彩与分量，考证康梁笔下对公车上书一事的回忆记述，并不涉及对康有为所撰上书内容的评价。

房德邻对茅海建的文章提出全方位的质疑。一是针对政治高层发动问题，作者认为翁同龢在签署马关条约的问题上和光绪帝达成了一致，因此并无故意泄露《马关条约》内容，授意发动公车上书的动机。二是针对京官暗中组织问题，作者认为京官大规模的上书是在清廷向外公布李鸿章已经签约消息后出现的，而在京官们上书之前康有为已经得知了消息，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上书反对，又策动湖南举人上书配合，形成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广东和湖南举人各联名上书又影响了其他各省举人，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是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并无京官暗中组织。三是针对康有为的自传真实性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的作用问题，作者认为康有为的自传年谱本无对外示人的打算，可信度应比其他史料更高。对于康有为的作用问题，作者认为在时间上，康有为鼓动起乙未年第一批举人上书，比京官的大规模上书略早；在规模上，他又组织了18省举人联名上书；在内容上看，他起草的上书乃是维新派的变法纲领。因此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当之无愧的领袖，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因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对于房德邻的质疑，茅海建再次发文回应，他在文章中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并指出他们二人的分歧源于不同史家对几乎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以及对史料价值的主观判断问题。

在这之后，学界基本不再对“公车上书”一事的真伪问题展开论辩，而是对佐证“公车上书”真伪的一些重要史料进行更深入的考证，张海荣是这方面较为重要的一位学者。张海荣对研究“公车上书”的重要史料“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署名的《公车上书记》的作者进行考证，认为他就是翰林出身、家道殷富、长年居家礼佛的居士沈善登。张海荣还以“公车上书”亲历者晚清举人邱菽园的两次追忆进一步澄清“公车上书”真伪的相关问题。邱菽园本人前后两次的叙述并不一致，作者认为邱菽园第一次的跋语较多体现了他对于“公车上书”的个人记忆和亲身感受，第二次的跋语则很有可能已受到康有为或“康党”的影响。这让我们对于“公车上书”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同时也向我们提出更多疑问，使我们尽量寻找“康党”之外的声音，朝着

接近真相的方向继续推进。

## 2 “一纲多本”时期高中历史教材对于“公车上书”的相关表述

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教材出版之前，高中历史教材处于“一纲多本”的状态，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对“公车上书”的介绍大体遵循康有为自述中的说法，只是在背景介绍与行文表述上存在些许差异。

四个版本的教材中，以岳麓版教材对“公车上书”的介绍最为详细，正文部分以四段文字对公车上书事件进行介绍。其中第一段对于公车上书原因的表述其实是来自康有为在自传中对当时历史情境的回忆。对于公车上书最后的结局与历史影响，岳麓版教材的表述也基本与康有为的自述保持一致，认为是保守派官员从中阻挠导致光绪皇帝未能看到上书，但上书本身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岳麓版教材又在正文之中穿插了楷体字的附注部分，详细的描绘了公车上书发生的经过，并对发生地松云庵做了简要的背景介绍。其中的一些历史细节，例如康有为主动请缨等均来自康有为的自述。教材还以《公车上书记》在上海的刊行作为“公车上书”影响力之大的证据，并配有“公车上书”题名记的书影。根据前文综述，“公车上书”事件发生不久后在上海刊印出版的《公车上书记》确实是众多学者对“公车上书”真伪进行考证时所用过的重要史料，教材选择这一史料的作用显然是证明“公车上书”事件为真。而对于“公车上书”事件的影响，教材强调这一事件是戊戌变法运动开始的重要历史节点，以及是维新运动从一种思潮转向政治实践的转折点，对于这一点历史学界的研究与各版本的教材的观点与阐述基本保持一致。

除正文部分叙述过程及影响以外，岳麓版教材还以教材辅助性栏目的形式解释了“公车”一词的由来以及公车上书的背景，这一部分的知识在目前的统编版教材中并没有呈现，但却是学生理解“公车上书”这一历史名词内涵的必要环节，教师应将这一部分有机融入教学之中。

总体看来，“一纲多本”时期，四个版本的教材都将“公车上书”作为戊戌变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去讲，对于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的介绍大体与康有为的自述相同，只是在参与人数、上书为什么没有被光绪帝看到、产生了多大的政治影响、如何评价公车上书的问题上略有差异，但对于“公车上书”具有政治实践意义上的拉开维新变法序幕的作用这一点的认识应该是达成共识的。

## 3 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对“公车上书”相关表述的更新与教学启示

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的表述显然有所更新，吸收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对一些争议进行处理。我们可以注意到教材对于“上书”的问题出现了两种表述，一是在京的官员以及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二是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各省举人联合上书。康梁的上书虽“未送达”光绪帝，但仍然作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序幕”具有重要意义。这显然是对史学界

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中的观点进行了吸收。

虽然目前学界虽然对于“公车上书”的一些细节仍有争议，但对于光绪二十一年因《马关条约》的签订，大批官员与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事，由于得到了档案的证实，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曾经组织各省举人联名上书一事和这篇上书没有送达到光绪帝手里的结局，学界也基本达成了一致。同时，对于“公车上书”一事作为戊戌维新运动序幕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学界也大都持肯定态度，这是统编版教材吸收学术界共识的一面。从这一具体案例出发看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代史部分的修订能够发现，教材的编写是立足于史学界近年来形成或强化的若干共识。这些共识涉及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动力、重大事件的性质、关键人物与历史评价等多个维度。教材编写者有选择地将相对成熟、稳定的学术观点，转化为符合高中教学要求的叙述语言与知识框架。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照搬专著结论，而是经过教材编审者基于教育规律与课程标准进行的凝练与重构，其核心在于将学术前沿的共识有效转化为培育历史素养的基础性知识。

而对于学界目前的一些争议问题，例如参与松云庵会议的具体人数到底有多少，这份上书上究竟有无举人签名、有多少人签名，这份上书是因为何种原因未送达到光绪帝手中，统编版教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选择暂时搁置争议问题，不做贸然的叙述。教材并未在正文中直接罗列关于康有为自述真伪、上书具体规模与为什么光绪帝没有看到上书等问题的种种学术辩论，也未纠缠于对康有为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评价。而是采取了两种方式：其一，侧重陈述基本史实与过程。教材清晰交代了事件的导火索为《马关条约》的签订、主要行动者为在京官员及举人，而对过程细节做了适当简化。其二，通过结构性叙述间接呈现复

杂性，将“康梁组织的上书”置于“朝野上下反对声浪”这一更广阔背景下叙述，引导学生思考个人行动与时代潮流、历史叙事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并非回避分歧，而是侧重于呈现基于可靠史料、符合国家主流历史观且被较多研究者所接受的基本判断。

#### 4 结语

由“公车上书”这一事件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统编版教材在处理存在争议的议题时，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侧重陈述基本史实与过程，对学术争论做适当简化或搁置；二是在正文或辅助栏目中，通过史料间接引导学生理解历史的多面性与解释的多样性，培养其历史思维能力，而非直接罗列对立观点。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教材作为国家育人载体，在学术性、教育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也为我们更好使用统编版教材进行历史教学指明了行动方向。

#### [参考文献]

- [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J].近代史研究,2005,(03):1-43+315.
- [3]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二)[J].近代史研究,2005,(04):85-147.
- [4]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J].近代史研究,2007,(01):116-132.
- [5]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J].近代史研究,2007,(02):111-131.

#### 作者简介:

宣莹(2000—),女,蒙古族,内蒙赤峰人,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